

# 舞者, 还是舞?

## ——论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

冯文坤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5;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通过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谱系、女性构成性、女性阅读策略等方面来讨论译者的主体性, 可以发现, 在翻译过程中, 作者、译者的主体性, 亦如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构成, 没有他者的参与, 其主体是不存在的, 只有通过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才能辨认出主体的踪迹。

**关键词:**翻译; 女性主义; 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1-0106-05

传统译论“抹去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差异”[1](66页), 认为译文仅仅是“派生的和非创造性的活动”[2](65页), 否定译者主体性与被认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把译者主体性化为“零度”, 是原著之“镜”, 在观念上, 认为译者可以消除自身的“文化痕迹”[3](522页), 由空灵之“我”介入原著中, 从而否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与原著之间相互促成所产生的变异性, 更进一步产生对译文/译者价值评判的话语谱系: 忠实与叛逆, 主人与仆人, 权威与服从, 男人与女人, 身体与服装, 等等[4](185页)。它们固化了翻译研究的语词意象(verbal image), 形塑了原著的中心地位, 使译者与译文处于边缘地位。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的形象谱系、女性的构成性、女性阅读策略等方面来讨论译者的主体性。

### 一 传统: 边缘化的译者与女性

在传统译论中, 译者是由原著之“源”所决定的, 因此译者是依附性而非创造性的。原著是 A, 译文是 B, B 必须借原著这个“鸡”生出“蛋”来, 但 A 却可以不依赖于 B 而存在。这一方超越和规定另一

方, 但不受制于另一方的思想方式, 正如冯文坤《自然思维与诗学再识》一书中所描述的, “如果 B 的存在、意义和重要性只有依靠 A 才能获得充分的说明, 而反之则不然。那么, 对于 B 来说, A 就是超越的, 即 A 是自在自为的, 是摆脱了外在事物的依托。但是 A 却是它事物存在的根据。”[5](162页)此种超越观支配了我们对于翻译中译者形象的认识, 甚至遮蔽了译者的正面形象。于是, 2000 多年来, 中外出现了诸多关于译者的喻说, 诸如“舌人”、“媒婆”、“译匠”、“一仆二主”之“仆人”、“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等等, 构成了丰富的译者形象谱系[6](20页)。译者非自主性和依附性使译者自身具有了传统女性的角色。据此, 约翰·弗洛里欧(J. Florio, 1603)指出, 所有的翻译“被认为是女性”, 译者是作者的侍女, 女人低于男人[3](309页)。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尼科拉·沃德·乔夫(N. W. Jouve)则声称译者占据着“女性的位置”。

就这样, 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印镜, 而女性也在译者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喻象。男

收稿日期: 2004-06-10

作者简介: 冯文坤(1963—), 男, 四川阆中人,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西诗学、英美文学、翻译学。

人/作者/原著代表着权力,而女人/译者则代表着对权力的屈从。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具有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阴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3](304页)。男女相对或作者与译者的一系列概念因此而出现:理性与感性、坚强与软弱、主动与被动、独立与附属、原本与摹本等等。这些概念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压力,而且持续固化着译者与女人的地位。福柯认为:“如此依赖于体制支撑和配置的真理意志,常常会向其他形式的话语施加一种压力,一种约束的权利。”[7](219页)同样,关于译者与女人在话语中的定位,一样不能体现实际中的译者与女性真实,但却形成了他们在话语上的持续再生产,从而再生产着传统女性与译者的神话。

## 二 作者与译者/女性:构成与差异

福柯指出:“哲学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在使之失效的语言中的播散,和在因其缺席而产生的空间中的多样化,大概是当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结构。”[8](225—226页)福柯的话高度概括了西方思想界语言学转向后所导致的“知识主体”瓦解图景。哈贝马斯把此图景称为“语言事件”:“先验主体性瓦解之后,分析的矛头便指向了使各个世界走出自身并相互勾结的无名的语言事件”,它“把希望寄托在变化不定、只能以流动的样态存在的语言身上,结果是内在世界的一切运动都源于这种流动”[8](225—226页)。承认语言事件,取消语言的所指(“无名”),消除语言意义的先在性,从而使文本/阅读者、作者/译者本身产生同一性。

由此不难理解德立达为什么说一切哲学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翻译问题,“哲学的起源就是翻译,或者是可译性的命题”[3](321页)。首先,德立达阐明反复出现的对立关系是如何源于性别概念与写作、模仿与忠实之间的合谋的,如传统的翻译观设想了一个积极的原作和消极的译本;创造在先,被动的传递在后。但是,如果承认再现总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原作与它的原创意图也有一段距离,话语中根本没有说话主体的完成在场,进而把写作和翻译视为彼此密切相关和相互依赖的事情。其次,语言所指自身的“延异性”取消了语言意义的授予者,动摇了寻找本源的神话。传统的翻译理论总认为有什么确定的意义需要和可能从一种所指系统转移到另一种所指系统,德昌达认为不存在这样确定的东西,在翻译中

人们所看得到的只是语言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9](146—149页)。因此,翻译是语言自身在说话,在这过程中,如福柯所说,上帝和人都消失了[9](155页)。而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看来,翻译成了一种思想的操作,是译者把自己的思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是语言学之类的转换。语言成了对对象进行解构的动力,而人成了语言的对象[9](155页)。

正是在上述理论环境中,女性对自己“给定”的身份与角色提出了质疑,对男性/女性仅仅由于生理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差异进行了根本的颠覆。在文本阅读中引入“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即承认女性自身体验、语言表述方面的特殊性,质疑男性话语中女性隐匿/贬抑或认同于男性而导致自身角色遮蔽的“无名”与“沉默”,因此女性“必须去寻找女性的主体表达”[10](18页),“呼吁用女性主义话语来言说女性的差异性,让这个话语构建的世界拥有女性自己的声音并努力使女性获得与男人精神上平等的地位”[11](35页)。女性主义翻译观具体为三个方面,即构成、差异与延异。

具体地说,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译者是彼此构成对方,彼此生成对方,彼此都不是独立的主体,只在相互对视中彼此滑入对象,并成就彼此。西蒙(Simon)指出:“在两者语言之间、原作与译本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以及由此类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不可能是绝对固定;相反,这些二元的排比应置放在一个连续体之中,在那里每一元都可被视为相对的。”[3](322页)苏珊·巴斯奈特指出:当代的翻译研究要打破的正是“原作和译本视为两极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并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12](63—73页)。这样,译文就不再是译者以“无己”之我去处理原著的再现行为了,而是重视身份(女性化/译者主体化)在翻译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女性以自我意向、自我体验、自我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被书写在原著之中,从而颠覆了长久以来被视为翻译金科玉律的“忠实性”(fidelity)原则。“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与写作方案——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其中的方案而言的”[3](310页)。

其次,女性主义翻译观主张原著与译著之间双向介入的同时,往往更强调女性作为“性属”(gen-

der)之差异性。对差异性的强调,是体现译者个体性、性别意识、特定角色的重要保证。传统翻译观重视作者权威/作者话语下的译者认同观,从而抹去了译者的身份差异性、历史性与特定审美维度。如果说女性写作或翻译曾经是边缘性的,那么他们正是通过边缘化对这个世界或作者世界加以纠偏,并通过自身的边缘言说,使中心变成可疑和不合法。戈达尔德(Godard)将女性差异身份介入翻译中称为“转化的身份诗学”(transformance of poetics of identity)[13](90页)。她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性的差异,她那无穷无尽的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把自己对操作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翻译中女人驾驭(woman handling)文本意味着她要取代那个谦虚而自惭形秽的译者”[13](91页),从而颠覆了那种基于透明诗学而视翻译为对等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将“性属”差异置于翻译之中,丰富了译者介入原著的多维性,也扩大了原著与译者之间的张力程度,强化了“翻译在界定和表达他性的力量”[3](315页)。如果在面对原著的译者构成性上曾经是译者-译者文化-译者审美内涵-译语读者期待视野的话,那么女性主义翻译观则应在此序列中加上“性属”,由此扩张了译者身份的丰富性。由此也可以理解巴斯奈特的话:在翻译中,“文化是多声部,是过程,是不断变化的符号群体,而非一个单一实体”[14](131页)。差异意味着丰富性,意味着开放性,意味着走出传统翻译研究中封闭的“原著/作者中心论”。翻译本致力于消除差异,但翻译又造成差异,或让差异介入。正如葛校琴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把视线转到差异上,转到二元对立中的弱者,转到众多的他(她)者,使文化中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色被展示出来,被人们注视,为差异的合法性辩护,为当今文化批评,为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11](38页)

### 三 阅读/翻译:延异与衍生

如果说,构成观承认译文是在译者/女性参与中共同构成的,而差异则体现了译者/女性以自身介入翻译过程,从而保留了译文中译者/女性的个性特征,那么“延异”则是女性翻译观所普遍奉行的一个翻译策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话语体系中一个核心术语。对于它的界定,犹如延异本身一样,是不可捉摸的。该词本身融合“differ”、“differe”和“defer”一体,是“区别”、“播散”和“延宕”三

义之合一。德里达本人对延异的解释也是玄乎其玄。他说:“延异既非一个词,也非一个概念”;延异是“差异的本原或生产,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不在场的范围”[15](111页)。按照阿伯拉姆斯的解释:“延和异这种双重含义是指这一现象,即一方面文本提供一个具有意义的‘效果’,这个意义是文本差异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提供的意义永远无法驻足于一个实在的在场、或语言之外的‘超念所指’上面,它的确定指意便在德立达所谓的一种无限延宕的运动或‘游戏’中,从一种语言阐释向另一种阐释推延。”[16](227页)可见,在德里达那里,延异作为语言活动的原理,是指意义确证的不可能性:一方面,在一个意指系统中,意义无一不是从它同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的差异中产生;一方面,由于意义不可能是拥有自明性状的绝对呈现,其确定指向便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一环环延宕下来,由一种解释替代另一种解释而永无到达本真世界的可能。故此,语言不再是索绪尔式的语言规则系统,因为“它把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并处于语言实践当中的主体活动归结为语法的基本结构和生成法则,以此来克服主体哲学。这样,主体性就失去了其创造世界的原始力量”[17](224页)[16](224页)。

由此,女性翻译重视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中间地带,重视逻辑与喻说之间的沉默,重视作者与译者/女性之间的互动与衍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与实践者斯皮娃克(Spivak)认为,翻译是“生产关于自我的意义”,视“语言为揭示性别化能动机制之运作的线索”[3](277页);“我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3](252页)。她还认为:“语言只是一条关键的线索,指向自我的界线失落之处。修辞或喻说扰乱逻辑的方式本身表明,在语言旁边,围绕着语言,存在着随机不定因素的可能性。这样的衍散(dissemination)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在翻译中,在意义于两种历史上得到名分的语言之间的广袤空虚里时隐时现中,我们如履薄冰般接近它了。”[3](279页)文本中的修辞与喻说,“犹如织好的布匹的边在松脱,散落成轨道”,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言词之间及言词周围的静默中活动”,以便建构其自己的世界场所[3](280页)。孟加拉语女作家马哈斯韦塔·德维

的小说书名是 Stanadyini, 即“乳房让予者”。斯皮娃克比较了两种译名: Breast-Giver 及 Wet-Nurse。前者有“乳房”、“身体器官”、“劳动工具”、“商品”、“女性”, 而后者则只有“有奶便是娘”之“奶妈”之义。但在德维的小说中, 乳房既是拥有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器官, 又是带有转喻作用的部分对象, 以代替作为对象的他者[3](282页), 而“奶妈”的译者却将其丢掉了。因此, 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 虽然完全尽心尽力地去想像“他者”是不可能的, 但只要按照“我”来想像“他者”, 用“我”来填补“静默”, “我”与“他者”就能在静默或中间环节中发挥能动作用, 从而既丰富了文本, 又重塑了译者/女性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上提倡补充差异, 体验“沉默”, 从而能动介入文本。最典型的例子还可以在弗洛图的文本中找到。弗洛图(Flotow)列举女性主义翻译家戈达德翻译的女性主义作家 Nicole Brossard 的小说 *L' Amer*。L' 为 La (the); Amere 代表三个词: mere (mother 母亲), mer (sea 海), amer (bitter 辛酸)。原文标题即是文字游戏。戈达德的翻译将 the 放在左边, 将 e, our, mothers 放在右边竖排, 左右之间置大写 S 表示海, 该标题成为:

/e  
the-S-our  
/mothers

组合成 These Our 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 These Sour 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 将以上三词的意思包含进去。在原女性主义表述的标题上再创新意。这一译者与原著共舞的翻译策略, 其目的正如哈沃德在译本《她人的信》的《前言》中所说:“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 目的是让语言为女性说话; 我的署名意指我采取了所有翻译策略,

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2](15页)[11](36页)

#### 四 主体性的反思: 舞者与舞

今天, 在认识女性主义翻译观时, 我们还应将其置于目前学术生态的整体背景之中予以考察。女性译者对处理文本的具体方式并非值得我们去效仿, 但其展示出来的阅读与翻译策略至少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语言的本质以及人是如何由语言构成的, 并反过来支配语言的再生产, 而这种再生产, 是增值的再生产, 而非单一的、透明的对作者、原著的再现。对于译者/读者来讲, 他们的实践对象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进行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 人们对阅读的兴趣之本质不仅在于语言是传递性的, 更在于语言能唤醒自己, 从而建构自己。“我”是通过“他者”来建构的, 无论是作者, 还是读者, 都是因为“他者”并且通过“他者”, 才使得“我”成为对“他者”说话的“我”, “他者”成为听“我”说话的“他者”。海德格尔曾说, 人要学会倾听。其实为了每个人更好地倾听, 因此每个人就必须学会言说, 从而充实倾听。作者与译者/女性, 我与他者, 译出语与译入语, 虽为形式上之两极, 但无法自身在场 (presence a soi)。没有他者的参与, 翻译的主体, 阅读的主体, 男人的主体, 女性的主体, 是不存在的, 只有通过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才能辨认出主体的踪迹。于是, 互为外在性存在的作者/文本、译者/女性都处在不停的运动状态之中, 又在词与词、我与他、我与瞬间的感受以及不断破除边界的运动中“延异”着一切的一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女性与作者/文本是什么关系呢? 是一种握手与拥抱从而预知对方的姿势的行为, 并且使对方的姿势得以完成。正如耶茨所言:“身随乐舞, 骤然一瞥, 安知是舞者, 还是舞?”[5](126页)

#### 参考文献:

- [1] Chamberlain, L.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es of Translation.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 Venuti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3]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4] Lewine, S. J. *The Subversive Scribe. 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n Fiction*. Saint Paul, NM: Graywolf Press, 1991.
- [5] 冯文坤. 自然思维与诗学再识[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 [6]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 (1).
- [7] Micha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8]福柯. 尼采、谱系学和历史学[M]. 引自: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9]Gentler, Edwin. *Co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10]马睿. 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突破[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2).
- [11]葛校琴. 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 外语教学, 2003,(6).
- [12]Bassnett, Susan. Writing in No Man's Land: Questions of Gender and Translation. *Ilha do Desterro*, 1992, (28).
- [13]Godard, B. Theorising Feminist Theo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S. Bassnett & A. Lefevere (eds) London: Frances Printer, 1990.
- [14]Susan Bassnett,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1.
- [15]德立达. 声音与现象[M]. 杜小真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 [16]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Orland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 [17]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 On Feministic Idea of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

FENG Wen-ku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Beijing 100875;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probing into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from the female-image perspective, female constructiveness and female reading approach based on current feminism, we point out that translation is formed with many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ng course just as the relation is formed between man and woman; without the other's involvement, there cannot exist a translator's /reader's/man's/woman's subjectivity, and the trace of subjectivity can only be recognized through the related "otherness". Therefore, any subjectivity concerning translators and man/woman is an extended reproduction of the other and any translated text is an extended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Key words:** translation; feminism;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责任编辑:张思武]